



## 碑志所见辽代赴西夏外交使臣事略考述

李宇峰

**摘要:** 辽代墓志所见赴西夏的外交使臣有两例,即韩椅、秦德昌。本文依据墓志记载,结合文献及相关的辽代碑志资料,对其生平事略及出使西夏的外交活动与辽夏关系史的影响做初步探索。

**关键词:** 辽代墓志 西夏 使臣

辽与西夏的正式交往始于辽圣宗统和四年(986),自李继迁叛宋降辽时起。关于辽夏外交使臣往来,早年清代学者吴广成所著的《西夏书事》一书就有涉猎。现代的研究成果有林旅芝的《夏辽通好》(见《西夏史》,香港大同印务有限公司1975年);吴天犀的《西夏大事年表》(见《西夏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吴广成(撰)、裘世俊等(校)《西夏书事校正》,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杨浣《辽夏通史年表》(见《辽夏关系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4月)。笔者在搜集辽代墓志时,发现辽朝外交使臣的资料极为丰富,其中涉及辽朝赴西夏的有两例,可补史之阙。今在诸位前贤研究的基础上,钩稽相关资料,以碑志所见辽代赴西夏外交使臣为线索,结合文献,略述其事略,望能对辽夏外交史的研究有所补益。

### 一、韩椅的家世,生平与事略

韩椅,《辽史》无传,但其墓志自1926年在辽宁朝阳出土以后一直备受学术界的重视和关注。20世纪30年代,就有中日学者进行考证研究。<sup>①</sup>据陈述先生论及,<sup>②</sup>韩椅乃是河北玉田韩知古五子韩匡美之孙。韩知古一系,家世显赫,是辽代汉族“勋阀富盛”的韩、刘、马、赵四姓之首。<sup>③</sup>据《韩椅墓志》记载,韩椅小名三哥,是韩瑜九子中仅存活的幼子,体貌魁硕,字量渊弘,尤工骑射,洞晓韬铃。韩椅仕于辽代圣宗,兴宗两朝,从政近50余年,作为辽朝的封疆大吏,统军理政,政绩斐然。韩椅最主要的贡献是外交活动方面,是迄今为止,辽代碑志所见出使次数最多的外交使臣。圣宗统和八年(990)。韩椅进入仕途后不久,即以御院通进官职,持节封李继迁为夏国王,<sup>④</sup>开始其外交生涯。统和二十三年(1005),韩椅为充贺正之副使宋。开泰八年(1019)奉使沙州,册主帥曹恭顺为敦煌王。<sup>⑤</sup>太平五年(1025)使高丽国贺王询诞辰。<sup>⑥</sup>兴宗重熙二年(1033)复南使于宋,<sup>⑦</sup>韩椅是辽代中

① 毕任庸《辽韩瑜韩椅墓志考证》,《人文》7卷3期,1936年。园田一龟《朝阳县出土的韩公墓志铭》,《满蒙》16卷7期,1935年。

② 陈述辑校《全辽文》卷5,第98页,《韩瑜墓志铭》文末所附韩氏(玉田)世系表,中华书局1982年。

③ (元)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48《卢龙赵氏家传》。

④ 《辽史》卷13《圣宗四》:“十二月庚戌,遣使封李继迁为夏王国。”中华书局1982年,第140页。

⑤ 《辽史》卷16《圣宗七》:“八年壬戌,封沙州节度使曹顺为敦煌郡王。”中华书局1982年,第185页。

⑥ 张亮采编《补辽史交聘表》:“遣监门卫大将军韩椅、贺高丽生辰,以七月辛巳至”,中华书局第58页。

⑦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2仁宗明道二年。

期圣兴两朝文武兼备的著名外交活动家。

韩椅一生三娶夫人，共生三男五女。先夫人生二女，继室萧氏生三女，三夫人张氏生三男。“孟日齐家奴，废疾居家，受浮屠之法，先公五稔而逝。仲日貽孙，左丞制合门祇候。季日貽训，冠而未仕”<sup>①</sup>。

西夏初立国时，先是依附北宋，而后当辽宋对峙处于战争状态时，西夏太祖李继迁为了与宋抗衡并伺机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采取联辽抗宋的策略。而辽代则想利用李继迁牵制北宋的军事力量，因此一直想方设法拉拢利用西夏。李继迁原是宋朝定难军管内度知蕃落使。叛宋以后，自称定难军留后。降辽以后，辽圣宗即给李继迁加官进爵，授予李继迁定难军节度使、银夏绥宥等州观察处置使。特进检校太师、都督夏州诸军事等职。统和八年（990），辽又晋升李继迁为夏国王。翌年，李继迁长兄、宋朝复封的定难军节度使李继捧降辽。圣宗封其为西平王，统和十五年（997），李继捧被宋朝逮捕后，又封李继迁为西平王。统和十八年（1000），辽朝又封李继迁之子李德明为朔方节度使。就西夏而言，虽然名义上成了辽的属国，但不过是一种外交手腕。它利用辽宋之间的矛盾，有时联辽抗宋，有时结宋抵辽，反复无常，乘机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所以，辽与西夏的关系始终很微妙。尽管如此，辽与西夏在长达七、八十年时间内，虽有小冲突发生，但双方基本上处于联盟态势，互成犄角之势，合力夹击北宋，在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形成三国鼎立的抗衡局面。有学者论及，西夏实际上成为辽朝在西北方面对宋作战的一支偏师。<sup>②</sup>统和七年（989），圣宗封王子帐耶律襄之女为义成公主。屈尊下嫁李继迁，并赐马 3000 匹作为嫁妆。这样，辽夏关系由宗藩之属一跃成为甥舅关系。统和八年（990），遣使封李继迁为夏国王。但《辽史》未记派遣何人出使，今据韩椅墓志可知，韩椅曾与统和年间出使西夏，“持节封李继迁为夏国王”。但墓志未书韩椅于何年出使西夏，两相对照，可知是圣宗统和八年（990），“十二月庚戌遣御院通进韩椅，持节封李继迁为夏国王。”其官职，时间均与墓志所记相合。据有学者论及，自圣宗统和四年（986）西夏李继迁与辽朝结盟，到圣宗统和二十年（1002）李继迁中流失身亡，前后 17 年，李继迁谨事辽朝，每年向辽朝派出的进贡、贺正旦、贺生辰等使节不绝于道。<sup>③</sup>据笔者依据《补辽史交聘表》所记统计，在此期间，西夏派出使辽朝的使节约有 30 次，辽朝派出使西夏的使节有 4 次。<sup>④</sup>辽与西夏的外交往来日益密切。辽兴宗即位后，辽夏政治联姻又进了一步。兴宗景福元年（1031），兴宗履行先帝圣宗与西夏的约定，将其姊兴平公主下嫁给李德明之子李元昊，以元昊为驸马都尉。双方保持翁婿关系。兴宗重熙元年（1032），李德明薨。册封其子夏国公元昊为王。兴平公主下嫁李元昊后，两人感情始终不睦，就在李元昊即大夏国皇帝的兴宗重熙七年（1038），兴平公主突然染病而死，这件事情导致本来就日趋紧张的辽夏关系公开决裂，兴宗遣北院承旨耶律庶成持诏诘向兴平公主死因，两国从此失和，并为后来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辽兴宗亲率十万大军讨伐西夏投下了阴影。

## 二、秦德昌的家世、生平与事略

秦德昌，《辽史》无传，仅《辽史·兴宗纪》一见其名，<sup>⑤</sup>秦德昌墓志于 1990 年 6 月在辽宁省建平县三家乡五十家子村出土后，<sup>⑥</sup>先后有学者对其进行考证研究。<sup>⑦</sup>据墓志记载：“苑平县池水里□□

① 韩貽孙、韩貽训不见于《辽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93 仁宗嘉祐六年、《陈襄使辽语录》分别有貽孙、貽训之载，应为韩椅的仲子、季子。

② 林荣贵、罗贤佑《辽圣宗实行善宋制夏政策及其历史作用》，《民族史论丛》第 1 辑、中华书局 1987 年。

③ 杨浣著《辽夏关系史》，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第 88 页。

④ 张亮采编《补辽史交聘表》，中华书局 1958 年。

⑤ 《辽史》卷 18《兴宗一》：“十二月辛卯，以萧迪、刘三、耶律元方、王惟志、耶律庶忠、孙文昭、萧绍筠、秦德昌充贺宋生辰及来岁正旦使副”，中华书局 1982 年，第 222 页。

⑥ 李波《建平三家乡辽秦德昌墓清理简报》，《辽海文物学刊》1995 年 2 期。

⑦ 李宇峰《从出土墓志略论辽朝中期与高丽、西夏之外交》，《辽海文物学刊》1993 年 1 期；都兴智、田立坤《辽秦德昌墓志考》，《辽海文物学刊》1995 年 2 期。

□□□□□因受封于秦而得姓焉。”苑平县池水里与1957年在北京复兴门外公主坟附近出土的辽天庆四年（1114）王师儒墓志所记：“翌年四月五日归葬于析律府宛平县房仙乡池水里之西北原”<sup>①</sup>，应是一地。宛平即宛平，唐德宗建中二年（780），析幽州蓟县为幽都县，辽圣宗开泰元年（1012），改幽都县为宛平县，治所即今北京市公主坟一带。可知秦德昌原籍为宛平县池水县人，“桑河”即桑乾河，即今北京永定河。

据秦德昌墓志记载：“曾祖美，左拾遣，知缙阳县事；列祖遂。兵部郎中，知范阳县事；皇考英照，入内左番殿□□……。”可知秦德昌的祖上三代仅做过一般较低级官吏，其家世并不显赫。秦德昌发迹较早，据志文记：“公初十六，会秦晋国王宅燕，见其体貌魁秀，知后必为伟器，因荐于圣宗，果顾之亦□□禁掖。”按秦德昌卒于道宗咸雍十年（1074），享年78岁，古人皆记虚岁，向前推之，秦德昌当生于圣宗统和十五年（997）。16岁时即圣宗开泰元年（1012），由秦晋国王即圣宗皇太弟耶律隆庆推荐给圣宗。入宫之后，受到圣宗特别宠爱，“赐养母以育之，凡帐幄敷设，饮食服乘，随季所赐，与诸王子无异”，即享受皇室王子待遇，后又“东宫伴射”，与时任太子的兴宗过从甚密。辽兴宗即位后，秦德昌立即受到重用，入阁门凡40余年，重熙末始出镇地方，先后担任安、营、思、榆等州刺史、永、利二州观察使，玄宁、奉陵、天城、保安等九军节度使，做为辽朝的封疆大吏，统军理政，政绩卓然。与政治、军事方面的才干相比，秦德昌在辽兴宗朝的外交才能尤为突出。据志文记秦德昌入阁门之后：“某间出使者三，于东韩、南宋、皆循常礼而已。”东韩当指高丽、秦德昌出使高丽事不见《辽史》及《高丽史》记载，仅墓志一见，十分难得。南宋应指北宋政权，宋、辽自澶州结盟修好后、双方使节络绎不绝，秦德昌于兴宗重熙九年（1040）出使北宋，充贺正旦副使是例行外交礼仪，并与《辽史兴宗记》记载相符。<sup>②</sup>据墓志记载，秦德昌：“重熙中，兴宗问罪于西夏，遣公召夏王李元昊、奉命既严，乃曰：李王据虎狼之国，不可以柔而致。遂直诣其厅之前下马。入厅限内见之。李王欲正坐，公请并坐，曰：何得倨见上国使臣，及辱万乘，亲征行銮咫尺而不朝见，毋恃小小土疆，至如十倍于此，亦不劳瓦解。李王愠色，殊无礼待。公曰：草莽之身，直如亡命，亦且无憾。李王遂朝。”这段史实系墓志所刻，应视为实录，是弥足珍贵的史料，可补诸书失载。参照文献可知，此详指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兴宗亲统十万大军征讨西夏之事。关于这场战争的起因可上溯至辽夏河西之争。在圣宗朝，西夏作为辽朝的藩属国之一，谨事辽朝，称臣纳贡有加。但从圣宗末年起，特别是从兴宗即位之初开始，辽夏关系即出现微妙变化。随着西夏国力的逐步增强和独立倾向日趋明显，辽夏关系逐渐显露出不和的迹象。原本潜伏的矛盾开始表面化。兴宗重熙七年（1038），李元昊即位大夏国皇帝，又连续与北宋作战胜利。重熙十三年（1044），宋夏签约议和，宋册封元昊为大夏国王，并许以岁币银七万两、绢十五万匹、茶叶三万斤。西夏国力的迅速增长遂引起辽朝的顾虑和警觉。由于兴平公主之死，导致辽夏关系出现裂痕。因为西夏对北宋战争的胜利，西夏不仅控制了河西战略要地灵州，也几乎控制了东西交通的命脉，并乘机试探与辽朝争夺辽夏边境诸部的统治权和对西域诸国的控制和影响。早在西夏建国之前，在辽朝太祖神册年间，辽与西域诸国文化交流就十分密切<sup>③</sup>，辽的西北边境分布有乌古、敌烈和阻卜（鞑靼）等部落，当时都是辽的六十属国之一，皆向辽朝称臣纳贡。据新近发现的辽圣宗统和十八年（1000）的高嵩墓志记载，在圣宗统和年间，皇太妃胡辇即统兵抚定西边，“俄逢皇太妃专征之事”，<sup>④</sup>指的是圣宗统和十五年（997）皇太妃平定鞑靼叛乱之事。由于这些矛盾的激化，致使辽夏关系雪上加霜，又加原先归服辽朝的党项等部叛附西夏，重熙十三年（1044）五月壬戌朔，“罗汉奴奏所发部兵与党项战不利，招讨使萧普达、四捷军详隐张佛奴歿于阵、李元昊来援叛党”。<sup>⑤</sup>这件事遂酿成战祸，成为辽兴宗亲征西夏的导火索。参照《辽史》记

① 陈述辑校《全辽文》卷10《王师儒墓志铭》，中华书局1982年，第290页。

② 《辽史》卷18《兴宗一》：“十二月辛卯，以萧迪、刘三、耶律元方、王惟吉、耶律庶忠、孙文昭、萧绍筠、秦德昌、充贺宋生辰及来岁正旦使副。”中华书局1982年，222页。

③ 张郁《草原丝绸之路——契丹与西域》，《内蒙古东部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文集》，第110页。

④ 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辑注《辽代石刻文续编》，《高嵩墓志》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7页。

⑤ 《辽史》卷19《兴宗二》，中华书局1982年，第230页。

载可知，兴宗是重熙十三年九月亲统十万大军征夏，十月辽朝大军压境，当时兴宗驻军河曲。逼近西夏腹地，李元昊十分恐惧。辽兴宗是先礼后兵，派秦德昌问罪于李元昊。秦德昌恃辽朝军威，敢于单人独骑直闯李元昊官厅之前，面折元昊，不辱使命，维护了辽朝的大国尊严，出色地完成这次出使西夏的外交使命，迫使李元昊上表谢罪，亲自到河曲朝见辽兴宗。兴宗赐酒，许以自新，遣之。<sup>①</sup>由此可以进一步推定，秦德昌出使西夏面折李元昊应在重熙十三年十月，即在李元昊到河曲朝见兴宗之前，碑志益于考史，证史，这又是一例。

除秦德昌墓志之外，有关这次辽兴宗亲征西夏的战争，在 1965 年于辽宁法库县前山出土的萧袍鲁墓志也有记载：“重熙中，银夏不恭。灵旗指伐，白旌黄镞。方亲御于六军，灭籍伍符，委分提于七校。以公押领殿中司一行兵马。公奋其勇，务在先登。提鼓建旗，连挫敌之锐。献俘援，常居诸州之先。泊王师凯旋，祖宫领至赏功，授本府敞史，历左金吾详稳。”<sup>②</sup>可知，萧袍鲁当时参与这场征讨西夏的战争，统领一支兵马，勇冠三军，屡建奇功，被兴宗皇帝封官进爵。另外，据 1995 年在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四家子镇羊山 2 号辽墓出土的刘祐墓志记载：“重熙中，伯兄柬、季兄祁从兴宗征夏。”<sup>③</sup>可知，刘祐的二位兄长刘柬、刘祁作为年轻的将士，亦参加了这场兴宗亲征的战争。三方辽代墓志从不同侧面记载了这场战争，足见此次战争的影响之大。辽夏之间的部族之争，长期以来，一直是辽夏关系中最不稳定的因素。辽朝认识到，介于辽宋之间的西夏政权反复无常，必须加强辽朝的西南边疆的防御力量。因此，辽兴宗在亲征西夏班师后第三天，即“改方州（今山西大同）为西京”。很明显，将西南重镇大同升格为西京，与西夏政权有很大关系，用以震慑西夏和西方诸部族。自重熙十三年（1044）起，至重熙二十二年（1053）止，辽夏交恶近十年，先后发生三次较大规模的战争。第一次即前已述及的重熙十三年辽兴宗亲征西夏之事。尽管《辽史》有意回避和隐讳这场战争的真情，但仍不难发现，实际上辽朝在这场战争中是处于不利地位的。虽然辽兴宗统率十万大军压境，长驱直入夏地，但李元昊大败辽军，获胜后又马上上表求和。第二次是兴宗重熙十八年（1049），辽兴宗企图趁李元昊新丧，联合阻卜压服西夏，遂复亲征西夏，欲报上次战败之仇。据《耶律仁先墓志》记载：“（重熙）十八年，大兵西举讨夏国，命王为都统军。”可知，<sup>④</sup>耶律仁先当时也参与这场战争，随兴宗亲征。但此次辽军小胜而大败，辽军既缺乏有经验的统帅，素质有较前逊色。因此初战失利，再战败北。但由北道行军都统耶律敌鲁率领的阻卜军在贺兰山俘虏了元昊之妻及西夏臣僚家属，并击退了来援的西夏军。第三次是兴宗重熙十九年（1050），先是西夏军企图乘胜攻拔辽朝边境要塞，后是辽朝报复性侵夏，长驱直入西夏首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大肆劫掠，又攻占西夏重要粮城摊粮城。直到兴宗重熙二十二年（1053），由于宋夏关系发生变化，辽夏关系渐趋缓和，辽朝始许西夏请和，西夏对辽称藩纳贡有加，双方恢复了正常的官方往来。自此，两国化干戈为玉帛，有辽一代再未发生战争，始终保持睦邻关系直至辽亡。

另据墓志所记，秦德昌的夫人李氏：“乃后唐庄宗四代孙，故上京大盈库使李佚之女。”后唐庄宗即李存勖。据史载，庄宗死后，有子名继潼、继嵩、继蟾、继尧，“并不知所终”。<sup>⑤</sup>从志文可知，庄宗诸子中有流落辽境者，其孙李佚仕辽为官，但李佚究为庄宗哪个儿子之子，现无法确指。秦德昌夫人李氏出身后唐皇室，是名门才女，晚年笃信佛教。在秦德昌死后，从宗敬寺尼临坛大德法显，削染受具，法讳道元。志文又记秦德昌与夫人李氏共育三男二女，长子绶，仕至六宅使。次子蕴才，少子运觞，皆出家为僧。蕴才是“镇国寺文□□主□□大德”。运觞是“镇国寺诠教大德”，兄弟二人同在镇国寺出家，秦德昌墓志就是蕴才请“文慧大师”撰写的。镇国寺之名，见于《全辽文》收录的《残碑捐施名衔》中。<sup>⑥</sup>内有“镇国寺显正大师赐紫显正”，及碑阳“镇国寺前尚座□辨，大德智雄、守智。

① 《辽史》卷 19《兴宗二》，中华书局 1982 年，第 231 页。

② 冯永谦《辽宁法库前山辽萧袍鲁墓》，《考古》1983 年 7 期。

③ 邵国田《刘祐墓志铭考略》，《内蒙古文物考古》1999 年 1 期。

④ 陈述辑校《全辽文》卷 8《耶律仁先墓志铭》，中华书局 1982 年，第 197 页。

⑤ 《旧五代史》卷 51《唐宗室列传》。

⑥ 陈述辑校《全辽文》卷 12《残碑捐施名衔》，中华书局 1982 年，第 34 页。

镇国寺祠主沙门可□、镇国寺前寺主超悟大德讲经沙门□□□□”等名衔，有学者依据残碑前列领衔者有“中京管内都僧录崇禄大夫检校太傅滨妙大师赐紫沙门”等推测，镇国寺应在辽中京城内。<sup>①</sup>今据赤峰博物馆 2002 年 5 月征集入藏的在辽中京附近发现的辽道宗大康八年（1082）幢石记载，<sup>②</sup>镇国寺应是辽中京城内的著名寺院，北宋使臣陈襄的《使辽语录》里亦记有中京镇国寺之名。秦德昌的次子与季子的名字皆在幢文中，蕴才在咸雍十年（1074）为镇国寺文□□主诠圆大德赐紫，而到大康八年（1082）则为昭先塔主。运觶在咸雍六年（1065）时为广严寺摄持大师弟子，大康四年（1078），则成为镇国寺诠教大德。广严寺和昭先塔均为辽中京的寺塔名称。秦德昌次女出家，法号园敬，宗敬寺妙行大德与其母李氏同在宗敬寺出家为尼。秦德昌居官显赫，夫人崇佛，二子为僧，一女为尼，正是辽朝晚期道宗时期崇佛信佛社会现象的反映。

（作者通讯地址：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沈阳 110003）

---

① 都兴智、田立坤《辽秦德昌墓志考》，《辽海文物学刊》1995 年 2 期。

② 刘冰《赤峰博物馆藏辽代石幢浅析》，《内蒙古文物考古》2008 年 2 期。